

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产生了并还在产生着世界性的影响。莫兰的生态思想犀利而深刻,既有对前辈思想家的继承,又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洛克(John Locke)、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马克思(Karl Max)、胡塞尔(Edmund Husserl)、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莱斯(Williams Leiss)等人之后,莫兰进一步探讨了人征服自然与人征服人的密切联系:“对自然的奴役从一开始就在以复杂的方式对人类的演变进行着反馈。人驯化了火,火也驯化了人并给他一个家;火助长人的野性,让他用火来烧毁家园。制服乱流和爆炸力让人得以驾驭巨大的野蛮动力,但这同时也增大了人类历史的混乱性和爆炸性,并为其创造了全面自我毁灭的条件。植物的种植允许人创造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但同时也让他失去了狩猎—采摘—游牧的古老文化。对动物的奴役给人奴役人提供了范本。今天,对控制机器的奴役可能又预示着一种新型的人对人的信息奴役。”^①应当说,这样的观点前人已经反复讨论过,但莫兰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是结合了自然科学原理而进行论述的,他从控制论这个新角度切入问题,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视域、新的方法和新的印证。总体来看,莫兰的生态思想最具独创性的部分,是他对唯发展论和科技至上论的批判。

^① 埃德加·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吴泓缈、冯学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9页。

“与‘发展’决裂”

莫兰不仅不认同人们经常谈论、被许多人视为中心任务的“发展”，甚至还公然呼吁“与‘发展’决裂”！他相信，只要人们能够像他一样对所谓的发展作一番深入研究，就一定会接受他的观点。因此，首先要“解析‘发展’的概念，也包括那些被修正过的概念，诸如‘可持续发展’、‘可行性发展’或‘人类发展’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可持续发展’，仅仅是生态环境压力下的暂缓发展的一种考虑，并未挖掘发展逻辑的根源”。^① 如果不对“发展”的内涵及其主要目的进行分析、批判甚至解构，而只对其做些小修小补，加上一点修饰和限定，其结果很可能是使人们忽视了对现存发展观之实质的认识，进而继续沿着过去的发展之路向着更高更大更富更强发展，而严酷的事实已经证明，这样的发展正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正因为如此，莫兰对主流思想中的发展观进行了如下剖析和判定——

首先，莫兰明确地断定，现在这样的发展必将导致生态系统的总崩溃和人类的灭绝。“‘发展’所产生的力量将把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② “为技术经济的发展牺牲一切其他的发展，让有生命的生态系统恶化并面临死亡的威胁，在反馈的作用下，让人类也面临死亡。”^③ 诚然，与任何一种生物都有生存与进化的权利一样，人类作为这个星球的一个物种，自然也具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人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要生活得越来越舒适，同样也无可厚非。但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生态危机告诉我们，人对物质的无限需求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承载力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如果再不限发展，结果只能是加速奔向灭亡。人类不可能脱离生态系统而存活，而至少从目前来看，人类开发替代资源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不可再生资源迅速枯竭的速度，加剧环境污染的速度远远高于治理污染的速度，而且，科技的发展也还达不到在地球生态系统总崩溃之前建造出人造的生态系统或迁移到另一个星球的水平；那么，人类目前就只有一个选择：以生态系

① 埃德加·莫兰：《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见乐黛云、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第13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② 埃德加·莫兰：《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见乐黛云、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第13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8页。

③ 埃德加·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吴泓缈、冯学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

统的承载力来限制物质需求和经济发展。当然，生态的制约可以是动态的、相对的，即随着人类在开发替代资源、治理污染、重建生态平衡等方面的不断进展，生态对发展的制约可能不断放宽；但制约却是必需的、绝对的。没有刹车只有油门的发展无异于直奔死亡。人类（包括后代人）的健康存活和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就是发展的制动器。

莫兰的“发展”批判让我们意识到：“可持续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被误解甚至有意曲解了。一些国家现行的发展战略虽然也美名其曰可持续发展，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以确保后代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以确保生态的可持续性和生存环境的逐渐改善为前提，依然以发展为中心、为根本、为压倒一切的原则，依然主要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资本的最大化，依然在迅速地消耗即将告罄的不可再生资源，依然在严重污染环境并使环境状况在总体上日趋恶化，而在治理环境、开发替代资源等方面的投入却少得可怜。这样一种发展由于有了“可持续”的美名作掩饰而更具有危害性，因为它能够轻易地使人们丧失忧患意识、危机意识、理性判断以及对子孙后代和自然万物的责任感。生态哲学家贾丁斯（Joseph R Des Jardins）说得好：“可持续的说法太普遍了”，“让我们先停下来”，先问“可持续什么？”“很显然，可持续经常被认为是‘持续目前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这样的可持续生活模式只是持续现在的状态。但是目前的消费方式，尤其是在消费驱动的工业经济中的消费方式，正是导致环境恶化的元凶，现在的消费情形正是要改变的东西。……我们要警惕，不要只是简单地把可持续发展当作时髦词来谈论经济和消费的继续增长。”^①

其次，莫兰切中要害地指出，“发展”的实质是经济发展，这样的发展将人类在人性解放、人格完善、安全和诗意地生存、与自然休戚与共、与他人和谐相处以及物质生活适度改善等多层面、全方位的进步和完善之需求，缩减成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物质生产的发展，严重忽视了人类精神和文化的发展。“‘发展’的概念总是含有经济技术的成分，它可以用增长指数或收入指数加以衡量。它暗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经济技术的发展自然是带动‘人类发展’的火车头”。“‘发展’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忽略了那些不能被计算、量度的存在，例如生命、痛苦、欢乐或爱情。

① 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林官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6页。

它唯一的满足尺度是增长(产品的增长,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货币收入的增长)。“‘发展’忽视不可计算、不可变卖的人类精神财富,诸如捐献、高尚、信誉和良心。‘发展’所经之处扫荡了文化宝藏与古代传统和文明的知识。‘欠发展’这一漫不经心的粗野提法将人类文化智慧与人生艺术贬得一钱不值。”^①莫兰彻底否定了“发展”能够自动消除生态危机、所有生态问题都能也只能通过“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虚假预设:居然“有人天真和发疯到可怕地步,坚信工业增长在本质上起调控和有序化作用”,这种“残缺不全的伪科学”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和理论依据,而“事实上我们不过是进入了一个人口、技术、经济等呈几何级数甚至超几何级数疯狂增长的纪元。更糟糕的是,在我们看来是伟大调控者的工业增长……却破坏并继续在破坏文明与文化,它在我们社会和生存的根基上造成深重的危机”。^②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是为人服务的,而不是人为经济发展服务。经济发展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过程或手段。其目的是人更安全、更健康、更舒适地生存,更自由、更解放、精神更为充实、人格更加完善。“发展”的目的化,即与发展而发展,必然导致“发展”的自足化和“发展”的异化。“发展”异变成一个对人具有极大压迫力的自足体,必然会要求甚至迫使人为其牺牲最主要的追求、最重要的普适价值和最基本的权利,必然会以“工业的合理化”、利润最大化、生产效率最高化、“都市化、官僚制度化、技术化”等等“发展”之理,取代人性之理和自然之理。发展“合理化的无度的粗野性”“在地球上涵涌扩张”。^③

再次,莫兰精辟地指出,尽管“发展”已经全球化,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发展”当作第一要务,但事实上,这种所谓的“发展”并非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它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带有西方文明的消极因素和致命弊端,并被强加给全世界人民。“‘发展’这一表面看来具有普遍价值的概念,构建的却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神话。它是一架疯狂的西化发动机,一个北半球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南半球)的殖民工具。”“‘发展’本身带着所有西方文明中可疑的、有害的、消极的因素”,“以西方文明的模式、理想和目的为参照的‘发展’逻辑,忽视了西方

① 埃德加·莫兰:《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见乐黛云、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第13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6—8页。

② 埃德加·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吴泓缈、冯学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2、231页。

③ 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125页。

文明自身正在危机当中。西方文明的福祉刚好包藏了它的祸根”。^①至此,莫兰的唯发展论批判已经深入到文明批判的层面,令人联想到霍克海默、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哲学家以及沃斯特(Donald Worster)等生态思想家对西方文明的严厉抨击。沃斯特说得好:“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整个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自然的经济体系已经被推向崩溃的极限,而‘生态学’将形成万众的呐喊,呼唤一场文化革命。”^②只有通过文明批判和文化变革,形成真正堪称普适的价值观和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观,才有可能从思想文化根源上消除导致生态危机和生存灾难的隐患。

“科学已变得极其危险”

莫兰的“复杂思维范式”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科技的批判。20世纪后半叶以来,“我们到达了一个‘巨科学’的时代,技术—科学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力量”,具备了能够轻易地将整个地球及其所有生命彻底毁灭的威力。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关乎全人类的命运,关系到所有生命和整个地球的生死存亡。因此,科学技术绝对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情,也绝对不仅仅是有权力、有财力操纵科学家和科学研究的利益集团的事情;人类的每一个分子都具有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监督权和批判权,全体民众具有对科学技术的制约权和改造权。莫兰再三强调:“科学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事情,不能唯一地交由科学家来处理。……科学已变得极其危险,不能全凭政治家来处理。……科学已变成了一个国民的问题,一个公民的问题。我们应当诉诸公民们。不能容许这些问题与外界隔绝,不能容许这些问题成为在小圈子内策划的。”^③莫兰对科技至上的批判是层层深入的。

首先,他揭示了科技“坏的方面”,解构了科技的神明,呼吁人们不要对科技盲目崇拜。莫兰指出,“这个释疑的、致富的、征服性的和硕果累累的科学也日益

① 埃德加·莫兰:《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见乐黛云、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第13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② Donald Worster,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7, 356.

③ 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5、101页。

使我们面临严重的问题，……这个解放人的科学同时也带来奴役人的可怕的可能性，这个生机勃勃的认识也产生着消灭人类的威胁。”“科学的进步既产生造福的可能性又产生奴役或致死的可能性”；而且，更为麻烦和更为复杂的是，这两种可能性不是分离的而是密切相关的，“科学造福的方面的进展与它有害的或甚至致死的方面的进展相关联”，人们很难只保留科技的好的方面而剔除其坏的方面。科学技术的“坏的方面”主要包括：自大狂妄地与自然对立，以违背自然规律、干扰和扭曲自然进程为能事，化工科技造成全球范围的、日趋严重的、难以根除的污染，核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及其应用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等等。除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外，还有一个特别危险的现象，即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被金钱势力和政治势力所左右，“科学家们被完全剥夺了对这些从他们的实验室里产生出来的力量的控制权；这些力量被集中在企业的领导人和国家的当权者的手中。今后在研究和强权之间将有着前所未有的互动关系。”正因为如此，莫兰警告人们：“科学已变成……新的撒旦！”^①

文艺复兴以降，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技术获得了崇高的地位。反宗教和倡理性的革新进程，赋予科学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之不二法门的重大意义，科学被视为“唯一一个建立在理性和严格的数学语言基础上的真理与实验体系”。“人们心甘情愿地称科学为现代的宗教，认为它远比被其取代的诸多宗教要神圣得多。”“对很多人来说，从正面来讲，科学‘永远正确’，从反面来讲，‘科学永远不会犯错’，正是这一专断信条使科学容不得半点批评。”“科学不仅凌驾于公民之上，也远离了公开的辩论”，在制造了大量不可根除的污染和无法挽救的环境灾难之后，它竟然还试图让人们相信科学家“能解决所有问题，科学和技术是万能的。一条遍布核能、生物或化学方面良好意愿的道路从危机频仍的地狱直接通向天堂社会”。然而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科技绝对不是永远正确的，科技所犯的错误甚至罪行罄竹难书，科学万能论和技术乐观主义（即所谓“自动技术进步”，或者说“车到山前必有路”——科技能自动开辟解救之路）是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科学依据的自欺欺人的假说。“人们不能采用导致危机的手段来解决危

^① 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5、95、69页。

^②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庄辰燕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5、7、47、27、36页。

机”，^②人们不能相信在数百年的短短时间里就把人类家园搞得资源枯竭、全面污染、满目疮痍、濒临崩溃的科学技术，能够在已经是十分有限的未来时间里引导人类摆脱危机——如果科技自身不进行深刻变革的话。

其次，莫兰对科学技术工作者缺乏社会责任、人类责任和生态责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既缺少科学的责任性又缺少关于责任性的科学”，这是莫兰对当代科学技术现状的一个基本判断。莫兰分析了科学家缺乏责任感的根本原因：至今仍占主流地位的经典科学观念认为，科学从原则上将事实与价值分离，“也就是说从它的内部排除任何伦理学的管辖权；在消除科学认识的主体的基础上建立它的客观性的公设。”科学把“为着认识而认识”当作自己的绝对律令，只要认识，不计后果。这一律令促使科学把任何戒律、禁忌和责任排除在科学之外，于是，“责任性因此是无意义的和非科学的。研究者从原则上和从职业上来说都是不需负责任的。”莫兰认为，这种把科学与伦理责任分离的绝对律令；如果说在科学刚刚兴起的时代和受到宗教政治排挤和威胁的时代还有其正确性和时代意义的话，那么，“在科学处于统治地位和威胁着其他事物的存在的时代就不再是正确的了”，“认为价值判断不适于科学研究活动的思想具有积极意义的时代结束了”。莫兰进一步指出，与社会责任感分离，必然导致科学不能认识自己，“不能科学地思考它本身，不能确定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不能预见它在当代的发展会导致什么——毁灭、奴役还是解放”，造成了可怕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的危机还不自知，还不知道反省和自我批判。^③

莫兰的科技批判的最后落脚点是：人类绝对不能把科学技术置于被监督的范围之外，必须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重审、批判、监督、制约和改造。科学技术头上的光环绝不意味着不受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和一切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公民监督的特权。“科学家并不是比他们的同胞崇高、超脱的人。他们有同样的渺小性，同样的犯错误的倾向。”“一些很高超的头脑、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杰出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实验室之外如其他为激情所驱使的好冲动的人一样行动，对于社会和政治的问题持有与随便哪个公民都一样平庸的观点。有时可悲地看到他们享有很高的威望却传播着错误的见解。”他们自诩超越伦理、超越价值、超越政治，

^③ 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7、90、95、94、104页。

标榜自己“漠视所有的政治—经济的利益,实际上却被后者所利用”。^①失去了监督、批判和制约的科学技术,就像失去了监督、批判和制约的权力一样,肯定会失控,肯定会走向专制(科技专制)和疯狂。在高科技具备了将地球毁灭N次的巨大而令人恐怖的能力的时代,一旦科技发展失控,它所造成的后果很可能比政治集权的后果更为严重,很可能是整个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的毁灭性的灾难!生态思想家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说得好,“过去,人们为科学的自由而斗争,今天,他们应当奋起限制科学的权力。”^②即使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真正的热爱,也要努力限制其权力,使之不至于迷失自己,不至于成为人类生存的威胁。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监督、制约和改造,是对科学技术负责,更是对人类、对所有生物、对整个地球负责。

① 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26—27、90页。

②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庄晨燕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7页。